乡村里的都市与都市里的乡村

——论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特点[1]

熊月之

〔摘　要〕针对时下不少论著和怀旧文字述及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片面地聚焦老上海的先进、繁荣、摩登一面，本文从民众文化角度切入，通过大量生动资料和具体统计数据，说明近代上海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极为混杂，说明近代上海贫富悬殊，能够享用高档娱乐设施的仅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由于这种混杂性，在城市化程度很低的近代中国，上海是乡村里的都市。由于居民移居上海的短暂性、同乡在上海居住的相对集中性、同乡交往的密切性、活动范围的狭小性，近代上海人的大多数其实是生活在都市的乡村里。

［关键词］上海；民众文化；混杂性

近些年，关于上海历史研究的成果出奇地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讲到二三十年代，不少论著、怀旧文字都聚焦在那时上海如何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灯红酒绿，如何先进、繁荣，如何摩登、时尚，这容易让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以为这些就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全部。本文从民众文化角度切入，旨在说明近代上海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贫富悬殊，是个极为混杂的城市。

一　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

关于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的世界性，或叫世界主义，这些年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很好的研究。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上海很多民众文化，就具有明显的世界性。比如，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学者研究表明，1880 年代《点石斋画报》里面许多画面、表现手法，是从英国的画报那里学习或照搬的，有的就是套用英国画报里的画面，将西方人换成中国人。19 世纪中期，上海英国侨民引进跑马活动。20 世纪初，上海从日本引进文明戏，从西方引进大型综合游艺场，以后又引进跑狗等娱乐活动。顾德曼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上海的中西报纸，有着广泛的深刻的互相渗透的现象[2]。李欧梵、汪朝光、姜玢等人有关上海电影史的研究表明，上海不光在放映好莱坞电影方面数量多、速度快，而且在影片摄制、表演艺术方面，都努力借鉴好莱坞。一般在美国本土放映两星期左右就可以在上海的电影院上映。[3]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本文想强调的是另外一面，即上海民众文化中的地方性。上海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存在着许多会馆、公所。由于近代上海人口是在短时期里急速发展起来的，来到上海的移民，往往离土未里根，身离魂未离，因此，他们大多保持着对家乡与上海的双重认同，回到家乡是上海人，住在上海是外地人。他们在上海，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守家乡风俗。《图画日报》有一段关于上海移民在小菜场里各操方言的生动描写：

> 砰！天明炮放了。呜！呜！呜！丝厂上工了。我们大家小菜场买小菜去。一北

---

[1] 本文用“民众文化”，而没有用“大众文化”，因为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学术界分歧意见太多。现在讲“大众文化”的，更多的是讲电视等传媒问世以后的市民文化，为较多人所接受的定义是：大众文化是指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来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的文化文本。

[2] 顾德曼：《上海报纸的跨国现象》，载马长林主编《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107—120 页。

[3] 姜玢：《凝视现代性：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文化与好莱坞因素》，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0 年），未刊稿，第 26 页。

京人高声曰：“咱要买窝颗儿（鸡蛋），几个大钱一个？”一南京人曰：“倭买一支狎子（鸭子），要飞（肥）”。一天津人曰：“哇要买大葱，多儿钱一斤？”一绍兴人曰：“鹤落要买甘菜（干菜）”。一宁波人曰：“阿拉买咸齑（咸菜）”。一徽州人曰：“阿街买居油（猪油）”。一杭州人曰：“我要买豆腐奸儿（豆腐干）”。一无锡人曰：“咸倪买点发芽豆”。一广东人曰：“唔买一根（一斤）油鱼”。一常熟人曰：“藕俚买斤朱肉（猪肉）”。一苏州人曰：“奴亚买一条五（鱼），格两日强得势哚”。一浦东人曰：“侬搭我称一斤烘干地力（风干荸荠）”。正在人声嘈杂，忽一松江人大呼曰：“巡捕巡捕，五拉倒用（倒运），铜钿本贼骨头铳去拉咧！疽！疽！疽！”于是巡捕帮同获贼，菜场上群目注视，见捕获贼而去。一外国人说：“怕立司佛哩咕得(Police very good)！”[1]

语言如此，娱乐文化也是如此。比如，在新世界、大新、永安、先施、大世界等游乐场里，就有各种地方戏的演出，包括平剧、越剧、苏滩、本滩、甬滩、大鼓、扬州戏、昆曲、蹦蹦戏、滑稽、文明戏、双簧、清唱、魔术、口技、电影等，每个场子总是人山人海。也有一些专演地方戏的，爱多亚路有几个书场专唱申曲，望平街福致里公园书场专唱常锡新戏，恒雅书场、老闸大戏院、永乐书楼专演越剧。上海江南人多，江南人爱听的说书场所就很多。书场本以城隍庙为发祥地，吴侬软语，叮咚弦响，后来扩展到租界，有东方、大中、汇泉、湖园、西园、南园、南京、中央、跑马厅书场等。[2]

上海民众文化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一头连着东西洋各国，一头连着中国各地。

二　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

对于上海民众文化的摩登性，中外学者说得很多很多，李欧梵所著书的名字就是《上海摩登》，上海学者又写了本《摩登上海》，还有许多图册，说的都是这方面内容。

关于这方面，我还可以作些补充。

比如，花卉展览、评比活动。这在西方城市比较普遍的活动，上海在十九世纪后期就引进了，每年都举行花卉展览、评比。这项活动是上海外侨引进的，以后华人仿效。从 1875 年开始，西人每年春秋天举行赛花会，选择开阔地方，搭棚展览各种各样名花珍卉，争奇斗艳。插花也可参赛。中西各家，均可参加。有乐队伴奏，同时供应茶点。花会组织评委会评定甲乙，优胜者给予奖励。第一次赛花会在 1875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地点在英国领事馆花园。第一日由西方人入园观赏，第二日让华人入内，门票视西人减半。1891 年在张园举办，花卉品种，难计其数，光香草就有数百种。[3]这无论在西方、东方都视为雅事，《孽海花》对此特别提到。

再比如，上海在引进国际上的杂技表演，非常突出。

1874 年 6 月，英国魔术师瓦纳在丹桂园表演戏法、影戏各套，上海市民称其“极其巧妙，变化无穷”。瓦纳所演魔术套数，有飞纸牌、帽中取物、人首分合等。时人记述：表演飞纸牌魔术时，台上障以绛帘，随乐声起而帘开，中悬一八角图，纸牌遍列其上。魔术师以指弹之，如飞絮落花，随风飘堕，然后取牌六张置枪中，机动枪发，振地一声，而牌仍在架。表演帽中取物时，魔术师取客一高冠，其中空无所有，手探冠中，则取出衣一，巾一，裤一，皮盒一。盒长五寸，盒中有盒，层出不穷。又向冠中取出纸裹洋糖饷客，冠转而糖出，有若连星贯珠，观众几乎吃遍。最为动人心魄的节目，是人首分合，演到这里，观众惊得目瞪口呆，屏气凝息，甚至不敢仰首正视。这种节目，今日中国各省市杂技团都能演出，但在晚清，上海人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

[1]《小菜场买物之拥挤》，《图画日报》，第 91 号第 7 页。
[2] 阿王：《孤岛戏剧近影》，《上海生活》，1938 年第 2 期，第 22 页。
[3] 《味莼园观西人赛花会记》，《申报》，1891 年 5 月 13 日。

1882 年夏天，世界一流马戏团车尼利马戏团在上海表演两个月，轰动一时，每晚观众两三千人，前所未有。所演节目除马寻手帕、女骑手跃横幅外，还有马上“叠罗汉、骑马放炮等。四年后，1886 年夏，车尼利马戏团再度来沪。所演节目有马上歌舞、走马换马、秋千软索等，各款新奇巧法，出神入化。出场动物有非洲青狮、锡兰白象、印度虎王及巨蟒等，各样珍禽奇兽，光怪陆离。

1890 年，西人在上海，特建“ 飞龙岛 ”游乐场，表演空中列车：

> 上海新创游玩之所名飞龙岛，在虹口汉璧礼路，现今马戏厅后，系由泰西算学士深明数理，讲求运行升降之法，用高脚铁路，机器轮车，随风上下，自然行走，车内并无煤火电气及各种用力机括，飞行绝技，真技艺之至奇，西学之最精者。兹设此岛以为中外人等避暑纳凉，消闲游玩。每车五排座位，每排两人，共坐十人，三车循环，行止迅疾，又极稳便，万无倾跌之虞。惟男客冠巾，女客钗鬓，为物太轻，恐防风凉坠地，当自检束。现在吕宋、新加坡、缅甸、五印度等处，新旧金山、日本均各修设完善，历其境者莫不赞美，但皆不过三四十丈，不及此地足有五百英尺。[1]

《点石斋画报》以《螳臂当车》为题，报道这一游乐设施，称其车不烦马力，不藉火力，不藉汽力，自然行走，妙用天然，忽上忽下，一坠一激，自高而下，势同建瓴[2]。《申报》的文章则称：“ 其下也，如黄河之水，一泻可以千里，其上也，如弄潮之船，鼓浪而前 ”[3]。

早在 1890 年10 月，上海就有载人气球表演。美国人范达山与华利先后在杨浦大花园、张园放载人气球，观者挤满园中，不下数千人，席棚高数丈，插美国国旗、中国龙旗。西女在气球所系圈上作种种杂技动作，高悬空中。观者企踵延颈，赞叹不已。[4]

早在 1903 年，上海就有类似冲浪冒险的游艺活动。这个活动场所设在著名的张园里。其法是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车作◣形，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人出小银元二枚，即可乘车，登台以后，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似悬空坠下，好像十分危险，其实全无问题。据说，“ 西人喜之，乘者颇众。华人胆怯，多不敢尝试 ”。寓沪文人孙宝瑄与友人放胆“ 乘坐一次，始大悟此戏可以练胆 ”[5]。

这些，不仅在当时中国城市中，就是在西方大城市中，也是很时髦的演出。

本文要强调的是，上海民众文化中，还有很强的传统性。

例如，城隍出巡。这在上海是历史悠久的民俗，也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很盛的民俗。每年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初一，一年三次，由五尊菩萨出巡，沿途观者，成千上万，仪仗蜿蜒数里之长，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出巡时，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吆喝“ 老爷来哉 ”，男女老少皆退立两旁，肃静无声。然后，依次是马队、旗队、马差、三班六役等，“ 菩萨 ”经过时，道旁男女老少，顶礼合十，焚香祷祝，拜倒在地。[6]

再如，盂兰盆会，源于佛教，相沿已久，近代上海仍然盛行，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很盛。史料记载，一至七月间，则梵呗之声、钟铙之响，喧阗彻夜，震耳欲聋。上海每至中元节前后，必举行此会，“ 茶余饭罢，散布街头，辄见旗旛飘拂，旃檀馥郁，门前悬挂明灯，五色相宣，触目皆是 ”，广肇山庄尤为巨擘，除延僧道讽经，室中陈设古玩画幅，光怪陆离，又以花草扎成各种人物鸟兽，栩栩如生。悬挂明灯万盏，上下参差。上海男女老少，摩肩接踵，香车宝马，如水如龙。[7]

还如，太平公醮。上海道教习俗，每年到了夏末秋初的七月，在会馆、公所以及里巷

---

[1] 《申报》广告《快游飞龙岛》，1890 年 7 月 18 日。
[2] 《螳臂当车》，《点石斋画报》，酉集，第 55 页。
[3] 《飞龙岛游记》，《申报》，1890 年 7 月 19 日。
[4] 《味莼园观放气球记》，《申报》，1890 年 10 月 14 日。
[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40 页。
[6] 《城隍出巡》，《社会日报》，1936 年 4 月 9 日。
[7] 《论盂兰盛会之无益》，《申报》，1892 年 9 月 2 日。

等都循例设坛建醮，广延道士，上海人谓之“打醮”。据说许多人死后，幽魂坠入了饿鬼道，全靠打醮来斋施他们。从七月开始，到处都在祭鬼，一直到七月底为止。一般所谓善士，怕鬼祟出现，为求公众安宁，每年到此时，就自动地发起，宁愿在别种开支上撙节些，但对这件事很热心赞助。在祭鬼热闹的七月，几乎条条街道、个个弄堂，到处都是“太平公醮”。

> 在打醮的里弄口，高挂着红色金字灯笼，上书“太平公醮”四字，考究的挂起玻璃灯、琉璃灯。弄堂里各家门口及房屋的外面，像栽着藤植物似的牵挂着几根草绳，草绳上挂着一串串的纸衣、纸裤、纸帽、纸锭、纸币，以及其他鬼所需要用的物品，同时其弄口张贴一张黄榜，跟衙门里的行文一样，用红笔点划。[1]

近代上海盂兰盆会、太平公醮、赛龙会这些活动，其宗教意义已经淡薄，已逐渐演化为民间娱乐活动，以至于许多人将盂兰盆会、太平公醮混为一谈，管它是佛教还是道教，反正就是热闹罢了。

> 那种念经念佛的音韵句子，听起来觉得另有一种风味，鼓、钹、锣、铃合奏的音乐调子，也颇动听，尤其是在晚上放焰口的时候更有趣，和尚道士们的拿手杰作似乎也要在晚间才会演出来，引诱得附近的居民都麕集于醮坛的四周，你看我，我看你，在这个人看人的场合中，除了旷夫怨女们可以得到一个眉目传情的机会外，其他的人物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恐怕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难以回答吧。[2]

> 那里有大头鬼、小头鬼，摇着扇子引人发笑；那里有踏高跷的，立在高过屋顶的木脚上，做什么“卖旧货”的玩意儿；那里有荡湖船，那里扮女妆的拼命地在卖弄风骚，唱着粗俗的十八摸；那里有“解粮车”二个青年的汉子，穿了京戏中短靠服装，推着特制小型的独轮车左冲右撞的飞奔；那里有宕“玉蜻蜓”的，胳膊下用铁钩子挂着一百多斤的铁鼎。[3]

> 当时，除了和尚放焰口外，道士唱“八出头”，另外再搭起一座台来，演着滩簧、文明戏、魔术等玩意儿，演到天亮为止。看的人是人山人海的多。[4]

城隍出巡，盂兰盆会，太平公醮，这些活动都是中国本土的内容，也是传统的内容。

当然，在传统的活动中，也有摩登的形式。比如，1938 年上海举行太平公醮时，醮坛的建设就是中西合璧的，竹篷上挂的是五彩电灯泡，“太平公醮”四个大字是霓虹灯组成的，醮坛的材料有玻璃的，磁板的，报纸上称“灯光与烛光四射，和尚与道士齐唱”。

上海民众文化，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一头连着摩登，一头连着传统。当然，传统也有变化。

三　民众文化的分层性

上海被称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上海娱乐业的分层，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娱乐场所是分层的。外国总会、租界公园、租界跑马厅是主要外国人的天地。舞厅、溜冰场、运动场、游泳池、酒吧、咖啡馆，也不是穷人所敢问津的。对于娱乐场所的分层，1936 年《社会日报》一篇文章写道：

> 人称东方巴黎的上海，一致公认以娱乐为中心的，可是娱乐也有上中下三等，跳舞、坐汽车、吃大菜，当然是有钱的公子哥儿、摩登太太享受的。公司乐园，那就是一般靠着生意吃饭、偷些闲功夫去逛的。一般以苦力赚钱的下流社会，他们既看不懂电影，又没有那么许多的钱逛公司（乐园），于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小戏院。
>
> 这小戏院全沪总算起来，有六十余家，扬州戏占了半数，绍兴文戏有十余家，淮戏（除扬州外大江以北名曰淮戏——原注）十一家，最少的就是宁波滩簧，只有三四

[1] 易人：《太平公醮在上海》，《上海生活》，1938 年第 3 期，第 18 页。
[2] 易人：《太平公醮在上海》，《上海生活》，1938 年第 3 期，第 18 页。
[3] 易人：《太平公醮在上海》，《上海生活》，1938 年第 3 期，第 18 页。
[4] 秋雨：《鬼的季节，太平公醮已开始举行》，《社会日报》，1936 年 8 月 19 日。

家。小戏院的开设，都是在小菜场所附近，他们的票价很便宜，有一毛钱或十七八铜元就可听一次。小戏院的设备是十分简陋，除了几张破布景外，还有几十套由石路买来的旧戏衣，又雇用了五六个人，甚么售票、查票、后台管理等，差不多每家都是这样，每一家戏院的演员只十八九人，串演一出戏的时候，往往一个人扮两个角儿不等，看起来好像教化子打架。[1]

其次，同一类娱乐场所，也是分层次的。最典型的是电影院。我们知道，电影放映分为首轮、二轮、三轮，电影院亦相应分为三级。电影院级别分布与居民分布状况有一定关系。姜玢的研究表明，在三四十年代，在公共租界、法租界的黄金地段，高档电影院比较集中，诸如大光明、南京、国泰等；在虹口、两租界西区，有一些中高档住宅区，外侨和华人中产阶层比较集中，好的电影院也比较多；在工厂运输区，诸如沪东、沪西的工厂区、火车站、沿江码头等地，这是租界华界接壤地段，生活设施较差，这一带电影院分布没有什么规则，只是在人口集中、市民较有消费能力的曹家渡、八仙侨一带，有些国产片的电影院；在城厢区，现在的南市，居民贫穷，设施落后，就没有什么电影院。放映外国影片的高级电影院，多处于繁华热闹的静安寺路、霞飞路、爱多亚路、西藏路，首轮电影院所在地，都是黄金地段，这里，外国人多，富裕人多，时髦人多，是显示财富、洋派的地方。在这里看电影，有一种显示身份的意义。[2]以电影院与观众群体对应关系而论，国泰多英美法等外国人，巴黎多“罗宋阿大”，光陆多洋行职员，丽都、金门多大中学生，新光、金城多女学生和舞女。[3]

再次，关于露天舞台之类。相当多的市民，其主要娱乐活动是在露天舞台。对此，《上海生活》杂志有许多非常生动的描述：

露天舞台是最接近民众的艺术。——从前虹口的红江庙、下海庙独多——多才多艺的演员先在地上用着粉笔划了一个大圆圈子，并且很熟练的写“平地舞台”的镂空字。然后，操起京胡，拉一阵《柳青娘》，这也是开场锣。纳凉的小市民，不期然而然的会聚集，团团围起来。苦中作乐的露天舞台以夏季最盛，现在演出的地点以沪西的曹家渡、法租界的南洋桥、英租界的新闸路等空地上居多，还有弄堂里也有发现。

露天舞台的演员，真是件件皆能，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这样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落得这一个怪可怜的场合里，真使人兴“上海吃饭难”之感！你想一把胡琴，自拉自唱，哼上几声“三姊不必泪双流，丈夫言来听重头，十担干柴米八斗，你在寒窑度春秋……”，同时还要唱几声“一更一点月正东……”的小调，还要奏一曲《何日君再来》、《永别了，弟弟》等，的是非凡。假使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怎能胜任？虽然是生得这样的灵敏，却是境遇是很可怜的，只要听到他们向观众讨钱的时候，就可以想到他们的境遇了。他说：“请大家赏光赏光，还要请多多的捧场。如果认为我唱得好，就请掉下几个钱来！出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如果认为不好，或者袋里钱不便，请二只腿帮帮忙，多站一会儿，捧捧场，免得我丢脸。如果一旦唱好了，你也走我也跑，叫我吃什么，还要请在场的各位爷叔帮帮忙！”这一席话，说来虽漂亮，赤裸裸地表示出走江湖的生活可怜呀。[4]

新闸路酱园弄口的露天游艺场，有说书的，变把戏的，卖梨膏糖的，唱小曲的，样样都有。[5]

街头演出也有为富裕阶层服务的。在一些富裕华人住宅区域内，一些有钱的太太奶奶，在夏夜纳凉无事的时候，高兴起来，叫一个唱本滩的来，唱一本《庵堂相会》、《刁刘氏》或

---

[1] 《小戏院，说不出的设备简陋》，《社会日报》，1936 年 7 月 27 日。

[2] 姜玢：《凝视现代性：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文化与好莱坞因素》，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2000 年），未刊稿，第 24 页。

[3] 《上海影戏院内幕种种》，《电影周刊》第 44 期，1939 年 7 月 12 日，转见姜玢论文，第 27 页。

[4] 江湖：《街头的露天舞台——上海夏夜的都市插曲》，《上海生活》1938 年。

[5] 《低级社会乐园，新闸路露天游艺场》，《社会日报》，1936 年 3 月 29 日。

《玉堂春》。还有一种叫“唱新闻”的，操此业者大多是宁波人，所唱为社会新闻，特别是关于男女之间的琐闻，被编成各种各样的小调，在弄堂里一路走一路唱着表演。唱的人也要有天才，因为一方面要唱得动听，一方面还要把新闻资料编得名副其实，一层一层地表达出来，使得听众眉飞色舞，津津有味，爱不忍释。其听众也以太太小姐为多。[1]

与露天游艺场相类似的有江北大世界、沪西大世界等贫民游乐场。

江北大世界，在闸北宝山路、永兴路口，四角方方的一座竹篱笆，占地十来亩，里面搭盖厂棚，有三四十所，小贩也如赶会似的，排列在内。记者描述：

> 当我跨进去，向左边一转弯，宁波滩簧，便在面前。台上是男女挡子，女的打扮得艳妖异常，一手捏着一块丝巾，飘飘的唱着那淫词小曲，屁股一扭一扭的动着，表演得异常风骚，当然这是最受劳工同志的胃口，场中起着不少的怪声。靠东边是国风社的平剧，正做得有声有色，后场锣鼓，色色俱全，可惜行头破旧不堪……他们一出方罢，用一只胡琴屁股，向场上各个观众讨钱，一个铜子二个铜子是随便你的，假使身边不便的话，他们也不一定是要的，而且叫你不要走开，帮帮场子。[2]

卢汉超书称，法租界也有“江北大世界”，在安纳金路。大世界东南的一些街区及八仙侨，也许是上海最大的露天游艺场，爱来格路、东自来火街、西自来火街、宁波路等街区，也都挤满了不同类型的娱乐场子，节目有独脚戏、说书、魔术、唱大鼓、花鼓戏、车技、西洋镜、木偶戏、剑术、走钢丝、斗兽、说因果、气功表演、吞剑表演、驯猴、畸人表演、说唱等。[3]

沪西大世界在小沙渡大旭里隔壁荒场，又叫地舞台。据报道，那里如像庙会一样，有三四十个棚子，吃饭摊子占三分之二，有大京班三处，江北戏二处，本滩一处，玩戏法的一处，打拳的二处，说书的一处，每种戏只要花上几个铜板就可以入座，每逢礼拜六下午和礼拜天，总是人山人海。纱厂男工友去的很多，女的较少。所唱的多是《汾河湾》、《狸猫换太子》、《武松打虎》一类杂戏。[4]

1936 年，《社会日报》有一篇文章，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夏日夜晚上海穷人的娱乐生活，这里不避冗长，引录如下，从中可见民众文化之一斑：

> 富人们在高大的洋房里，电风扇不断地摇头吐出风来，麻将八圈，眼目清亮，大姐开汽水，娘姨拿香烟。
>
> 穷人们在三层搁上，亭子间里，闷热得 在火炕上，臭虫蚊子，向你总攻击。大便在这里，烧饭也在这里，洗浴与卧室也在这里。两层搁上的孩子在哭，灶坡间的夫妇在闹，心里烦恼着，芭蕉扇不断地摇着，汗珠仍旧渗渗地流出来。
>
> 太阳渐渐的斜西了，弄堂里吹入一阵阵的晚风，于是穷人可以享点小福，从三层搁，亭子间爬了出来，上身赤膊，下身一条短裤，芭蕉扇一把，坐在弄堂里。这时，后楼阿大，灶坡间好婆等，不约而同的来集在一处，于是阿大与阿三阿四，大谈特谈，上谈玉皇大帝，派协天大帝下凡救世，中谈陈济棠飞机飞掉，下谈昨天某家娘姨，与某家车夫，在某处开房间。
>
> 另一堆人，后房好婆，搁楼阿娘，后楼嫂嫂，他们的谈风不同，“某处观世音菩萨灵验，昨晚求到三槐，今早就开三槐”。“第五家的男人，外边有小房子，女人是某游戏场的女招待”。“对过阿六女人，一只发财打了又拿进去，不然，我一副三抬……”
>
> 侧边四五个人，他们又是一群，团团坐在小凳上，拉着二胡，伸长了喉咙，唱着萧何月下追韩信。其他的呢？把手拍着扳……
>
> 女人群中，她们转了方向，把灶坡间的电灯拉了出来，一只小抬子，隔壁老太太

---

[1] 江湖：《街头的露天舞台——上海夏夜的都市插曲》，《上海生活》1938 年。
[2] 《江北大世界，突然兴旺起来了》，《社会日报》，1936 年 1 月 4 日。
[3] 卢汉超：《霓虹灯外——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第 86 页。
[4]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3 页。

戴着老光眼镜。对面阿大女人，抱着怀里婴儿，宁波阿娘捲起袖子，后楼嫂嫂两旁立着四五岁的儿子，四个人团团地坐着，一付麻将牌，从牌匣子里倒出来。各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小孩子在哭闹，百事不管，只顾白板当心失碰。

在麻将台的左边，地上铺了一条破席，席上坐着亭子间里先生和后楼阿五，借着电光，正在下棋。阿五的马，给亭子间先生的车围着，所以阿五全副精神注意，设法救出马来，在楚界的中间，写着“河边没有草，牛儿少开口”，对面三层搁的阿三，不识相地在叫阿五的炮，可以偷车将。

这时来了一个新兴实业家——卖橄榄者——头上戴着水手的白帆布帽，红鼻子，装着假发，腰里挂着只大袋，手里拿四五尺长的大扇子，嘴里喊卖橄榄，顿时把弄内的空气冲破了，小孩子不管他妈给隔壁老太太敲去一付三抬，向妈要钱买橄榄。

一个文盲文化传递者——卖新闻的老枪——手里拿着油光纸印成的画纸，拖着鞋皮，神气活现口里喊着：“要看新闻，新娘子花轿一条大蛇……”。于是阿二阿四小孩子等，各买一张，一面看着，一面嘴里说着，“蛇必定是蛇精。”

夏夜弄堂里的情形，真是一幅很好的漫画，表演出夏夜穷人的生活。[1]

当然，这篇文章里面所说到的穷人，都是没法享用高档娱乐设施的。

对不同层次娱乐设施的享用，与人们不同的经济收入有内在关联。1935 年，上海华界农、工、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无业人员，共占总人口 80.9%；公共租界的农民、工人、家务、杂类人员，共占总人口 78.8%。这些人基本上无力享受首轮、二轮外国电影或舞厅、留声机、溜冰场等娱乐文化。也就是说，即使在上海所谓黄金时期，享受比较高档娱乐设施的人，也只占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民国末年也差不多。1950 年 1 月，上海 498 万人口中， 15 岁以上为 346 万，其中失业、无业人口近百万[2]；在业者 206 万，其中农业、工业、手工业、建筑业、家庭佣工者为 93 万，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能力享受中高档娱乐消费的。有条件或比较有条件享受比较高档娱乐设施的，包括商人、金融、教育卫生、自由职业等方面人口，占在业人口 40%，占上海总人口不到 20%。

四　都市与乡村

近代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比起来，一大二洋，很不一样。从二十世纪开始，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 年中国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69 个，前 10 名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成都。这时，上海人口已有 240 万，比第 2 名广州（160 万）多 80 万，比第 3 名天津（90 万）多 150 万，超过后 4 名即苏州（60 万）、重庆（52.5 万）、香港（52.5 万）、成都（50 万）四个城市人口总和。近代中国是城市化很低的国家。1949 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 28.4%，中国城市人口 5700 万，仅占总人口 10.6%[3]。在农村人口占 90%的国度里，特大城市上海确实是芝麻里的西瓜。上海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是中国城市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60 年代开始有煤气路灯，70 年代开始有电话， 80 年代开始有电灯、自来水。至于洒水车、垃圾车、救火水龙，大自鸣钟，书信馆，地下排水系统，气象预报，卫生条例、违警条例，无不很早就有。到 20 世纪，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有线电台，无线电台，也使用得早而多。这些方面不但远比内地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与天津相比，煤气的使用早 19 年，电灯早 6 年，自来水早 14 年。晚清人称赞天津租界城市建设比较先进，

---

[1]《上海的夏夜弄堂－这是一幅穷人生活的漫画》，《社会日报》，1936 年 7 月 24 日。

[2] 1936 年到 1937 年，上海失业或无业人口就有 70 万人，抗战以后，上海这类人口更多。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1 页。

[3] 王祥荣：《生态与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调控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版，第 55、57 页。

便说“ 俨如一小沪渎 ”[1]，像个小上海。

《良友》画报曾发表一篇文章，讨论中国文化，将其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等级，即租界、都市、乡村、部落。文章将上海等有租界的城市从中国都市中分离出来，认为上海与其他城市不在同一个等级上，不能相提并论。画报以 16 幅照片，分别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对四个等级的文化进行比较。衣，在租界是一个摩登女郎时装，部落是形状特别的民族服装。食，租界是许多人在一个桌上的大餐，部落是牧民在吃奶酪。住，一是摩天高楼，一是帐蓬。行，一是汽车，一是骆驼。[2]《良友》画报的分类是有道理的。上海人将外地人，无论是乡村人还是城市人，都叫乡下人，其心理与《良友画报》是同样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之在中国，就是乡村里的都市。

但是，上海又是在短时间里急速发展起来的，市民绝大多数是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农民的习惯。卢汉超的研究表明，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上海回忆也证明，生活在弄堂里的近代上海人，很多人住所变动少，活动范围小，接触的人也很有限。近代上海，同乡相对集中居住、同乡交往密切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增强了各地乡土文化在上海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人的大多数其实是生活在都市的乡村里。

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这使得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呈现驳杂奇异的色彩，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多元，混杂，这就是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的特点。

多元、混杂是大城市民众文化的共性。上述现象在纽约、伦敦、巴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都不像近代上海那么突出。考其原因，不能不归结到上海城市特殊的发展道路，人口来源多元，社会组织多元，行政管理多元，城市文化整合能力薄弱，特别是人口积聚不是因城市内在需求在较长时间里缓慢增长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在短时间里急速涌入的，由乡民转变为市民的周期太短，速度太快，身在城市而神在乡村。纽约、伦敦、巴黎的民众文化有如西餐，虽然混杂，但有一道主菜，一主多辅，上海民众文化则如什锦拼盆。

集体记忆有选择性、当下性、片面性的局限。五十年代民族主义高涨时，人们强调老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桥头堡 ”特点；六十年代大讲阶级斗争时，人们强调其黑色“ 大染缸 ”特点；八十年代以后，又较多强调其“ 东方巴黎 ”特点。应该说，不同时代的不同说法都有历史依据，都揭示了上海城市的某一方面特质，但都不是老上海的全貌。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历史。如果人们在大谈“桥头堡”时，史学工作者多说说“ 西学窗口 ”，人们在侈谈“黑色染缸”时，史学工作者多说说“ 红色摇篮 ”；人们大谈“巴黎风情”时，史学工作者多说说地方性、传统性、落后性，这有助于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待历史，有助于纠正、消解各种片面性。

[1] 1884 年出版的《津门杂记》云：“ 天津开设通商口岸，始于咸丰十年庚申之秋……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辄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8－149 页。

[2] 《良友画报》第 166 期，第 24－25 页。